

第五章 開源與節流——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積累問題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於 1957 年 7 月正式發表。「新人口論」一文的內容中之所以提出節育的看法，背後真正的原因並不直接在於人口增長的情況本身，更爲根本的原因是在於因爲人多則消費多，將使得高速度積累不易完成，終而造成經濟的快速增長無法完成。此一觀點也使得馬寅初對於人口問題的理解角度有別於其他社會學者如陳達、吳景超等。自馬寅初獲得中共平反之後，眾多研究馬寅初事件的傳記和文章大量出現，但是這些研究都只把「新人口論」一文的焦點放在馬寅初強調中國大陸人口是否過多、增長速度是否過快的問題上，幾乎完全不注意到馬寅初將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問題連接在一起。如此一來，爲馬寅初平反雖然對 1980 年代初期中共推行強制性人口節育政策上有幫助，造成了人口研究的興旺與節育風氣的推廣，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卻有以偏概全之慮。如果我們注意到 1956-58 年間中共內部關於其國內基本情勢的判斷，並且瞭解這一判斷對後來中共如何加速經濟發展的政策企圖影響頗大，最終導致了大躍進的出現，也才能理解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文，爲何除了強調節制生育之外，同時還把節育上升到與經濟發展和積累相關的層面上。

1956 年中共第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共中央發佈第二個五年計劃，希望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礎之下，能在經濟方面有長足的進展。當時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進行工作報告，強調「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今後中共要以「經濟發展」爲施政重點，因爲目前中國最大的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根據麥克法夸爾的看法認爲，此一說法引來了毛澤東的不滿，因爲毛澤東認爲階級鬥爭仍是重心，過於強調經濟發展是不恰當的。¹而根據鄧力群近年的說法，1956 年八大報告中關於「階級鬥爭」和「經濟發展」孰先孰後，只是修詞問題，並未如外界所想像的那麼嚴重，劉少奇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階級鬥爭趨向緩和，但並未結束，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²儘管如此，中共面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的新階段，如何維持甚至超越原有的發展速度，並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突出其革命的代表性，的確是當時中共高層心中的重大問題。

對此，本章擬從下列幾個角度進行討論。首先，本文除將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下的消費與積累的關係，同時也將說明 1956-1958 年間中共經濟決策的重大背

¹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pp. 189-249.

² 鄧力群，「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七次講話」，1999 年 6 月 7 日-2000 年 7 月 8 日，*工農天地*，<http://www.gongnong.org/jnmzd/jmmao021203001.htm>。

景，並主要地集中在中共對經濟積累和發展的迫切心態。其次，筆者將把「新人口論」一文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還原到若干最基本的面向，即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文的中心思想，以及人口問題在此一中心思想中扮演何種角色。

第一節 消費、積累與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社會主義國家政經原則

積累的概念出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預先（previous）積累」一詞，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一書中，亞當斯密說：

……例如一位織工，他要能夠完全從事其特殊的業務，則不但在完成其織物、且在出賣其織物以前，事先（previous）必需在某一處所貯積資財，使足維持生活，並供給其工作的原料與工具；這種資財，或是自己所有的，或是別人所有的。這種積蓄（accumulation），一定在他長期以其勤勉從事上述特殊業務之前，即已存在；那是顯然的。³

在斯密的看法中，這樣的「預先積累」，必須滿足二個部分的需要，一是滿足其自身的溫飽，二是供給生產工作中之工具與原材料的花費。由於亞當斯密在看待積累的問題時係從收入面出發，因而同樣一筆資財（即「預先積累」），儘管其在生產領域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仍被歸為同一範疇。⁴

至於馬克思，則認為有兩種積累必須區別開來，一是「原始（primitive）積累」，一是再生產的積累。亞當斯密以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並沒有把這兩種積累區分清楚，事實上是強調了後者。「原始積累」則強調某一經濟單位要轉向資本主義化時，會有一段重要的起始時期，將生產工具或財貨資本化，同時將勞動者僱傭化。積累之所以可能，不但在於生產工具所有權的轉移，同時也包括了利潤（斯密語）或剩餘價值（馬克思語）的獲取，因而在時間序列上，此一過程可以說是所有資本的起始點。⁵

³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1), p. 47.

⁴ 如果從其用途和性質來看，同樣的一筆資財，用途和性質完全不同：一部分作為其維持生命的消費，購買生活所需之商品，成為終極的消費；一部分進行下一步生產的花費，即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入生產領域，這是生產性消費，會再創造新的商品，同時也產生新的價值。不但起點不同，結果也不同。

⁵ 詳見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p. 875-876, 877. 斯密的「預先積累」強調生產力的提升，而馬克思的「原始積累」則著重於生產關係的變革，同時，他強調此一歷史過程之所以是「原始」的，並非侷限在某一個特定時空或特定產業部門，只要某一個社會要從「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想要從原有的規模擴大，就得進行這一歷史過程，在時間順序上並非只有在一開始轉向資本主義的時候才出現，故而所謂「原始積累」並非指的是在時間序列上的優位性，而是邏輯上的前提性。

「預先積累」和「原始積累」，在更廣泛的意義下，都屬於再生產的積累，只是邏輯上的順序不同。馬克思批評斯密在不瞭解各時期各階段的社會型態以前便把諸如勞動、積累等這些基本的經濟範疇抽象出來，有理解上的便利性，但無助於對這些基本範疇的實質內涵的掌握，反倒是因而抹殺了各種社會型態的特點：

人體解剖對於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⁶

然而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之後，以及 20 世紀許多後進國家所採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使得馬克思純粹以私人型態出現的資本概念必須再進一步加工才能有效解釋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資本積累的概念經過阿明（Samir Amin）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更高度概括的「剩餘」和「積累」概念為其理論切入點（而積累來自剩餘），將二者的關連性與適用性，廣泛運用在各個經濟領域，成為解釋各個國家和各種社會型態下，工業化過程的必經初始階段。⁷另一方面，美籍的蘇聯問題專家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以英、法、德、美、俄、中、日、印等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為基礎，探討這些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由於農民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面對的情況，因而使其對農產品商品化過程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也因而造成了各國在走向現代化與工業化過程中不同的選擇：資產階級民主、共產革命與法西斯主義，印度則又是一個不同的型態。

8

二戰之後這些理論和歷史研究，對於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的「積累」與「剩餘」概念，有助於更加概括了解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

⁶ 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37。兩人的偏重點其實不同，斯密所企圖建立的是對於經濟積累的一般性解釋，因而在解釋資本主義這個特殊經濟型態的問題時，便產生了一些困難，馬克思則把積累專注於資本主義型態的積累，因而純粹討論資本積累，並且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到目前為止所發展出的各種不同經濟型態當中最為複雜、最為高度的社會，唯有對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的解剖，才能理解過往的各種社會型態。

⁷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Brian Pie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980, 1988). 尤其是華勒斯坦，以「剩餘」此一概念總括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以及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剩餘勞動，包括勞務、勞役、各種實物租稅等。

⁸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他在研究英國的現代化／工業化過程時斷言，為什麼英國能夠在經歷了 17、18 世紀的暴力行為之後（不論是革命或合法的圈地），在 19 世紀走向和平轉變，其條件有兩個：一是巴力門（parliament）的議會政治形式，一是小農經濟形態的消滅。他也稱這樣的歷史過程為「羊吃人」。詳見本書 p. 19.

發展。另一方面，阿明、巴蘭（Paul Baran）和摩爾等人的研究，也牽涉到國家對經濟的態度所具有的導向性作用。⁹

阿明關於積累在國際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其日後的研究中仍不斷發展和深化，他注意到在此一國際分工的體系下，邊陲地區該如何控制積累的五個條件。一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即確保農業部門糧產充足，在價格上糧商能獲利，同時能讓工資消費品的生產量跟上資本與工資總量的擴張；二是剩餘的集中，國家要有自己的金融機構，而且這些金融機構對跨國資本的流動有相對自主性，確保本國引導投資方向的能力；三是為國內產品保護國內市場，甚至在沒有高關稅等措施的情況下也能有少數產品與外國產品具有競爭力；四是自然資源（尤其是重要礦產），除了要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所有權，國家要有能力開發或保存；五是由本國控制技術，不論是本國發明或是技術引進，都可以很快複製，不用不斷進口生產設備和製程技術等。阿明認為，只有控制了這五個社會再生產要件，邊陲地區與當地的資產階級才可以作為民族資產階級與國家，亦即形成以本國為中心的民族經濟。¹⁰從阿明的理論可以看出，國家必須干涉經濟事務中的再生產環節，並藉由現代財經措施進行積累。因此，透過國家進行積累，便成為有別於市場進行積累的工具。

根據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積累」和「剩餘」的獲取和分配，並不一定要透過市場來完成，積累的成果也未必交由私人資本家，因而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策工具也就備受關注。像阿明等人一類的論點雖然有意無意間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前提預設，即主張市場自主和國家中立有所不同，但是一直要到1970年代以後更多的實証研究支持，此一論點才逐漸盛行起來。¹¹而史柯波（Theda Skocpol）等人不但在實証研究上繼續發展此一論點，更反省了美國學界長期以來的「社會中心論」，即強調市民社會內部成員的競合關係，決定了國家政策方針的走向，國家只是這些政策方針的被動接受者，中立於市民社會之外。史柯波等

⁹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p. 166-169. 阿明分析自殖民主義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歷程，認為到了二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主要先進國家的積累和擴張，都是以世界的範圍進行，因而在考察這些問題時，必須以全球的範圍作為對象。他指出，全世界由於在資本積累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大體形成了以歐美日為中心地區和以第三世界為主的邊陲地區。中心地區的積累係根據自身政經結構的體質，以自我為中心進行積累，邊陲地區的積累則是與中心地區形成垂直分工，將較多的剩餘流向中心地區。在國際貿易層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並非以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進行，而是以生產的絕對成本（即生產力和工資）來衡量。中心與邊陲地區都盡量壓低工資至其生存界限，可是由於中心地區的生產力較高，故工資的貨幣額將會提高，仍能保持國際貿易的優勢，因而在商品生產層面和交換層面都表現為中心與邊陲之間的不平等。

¹⁰ Samir Amin,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1990), P. 10-11.

¹¹ E. V. K. Fitzgeral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u since 19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 費茲傑拉（Edmund V. K. Fitzgerald）在研究了拉丁美洲（尤其是秘魯）在1960-70年代的政經變動後指出，國家介入經濟事務，尤其是對於資本投資、基礎建設的導向性與原材料的供應等方面，具有強力的主導性，國家可以透過各種財政桿槓（主要是稅種、稅率與匯率）掌控經濟、獲取並分配經濟剩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承認，拉美國家由於自身的政經體質，財稅方面的桿槓作用並無法像其他先進國家那麼奏效，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循環。

人認為，國家不但不是被動的接受者，甚至是主動的導引者，其影響的範圍不僅在經濟事務（這部分已廣為人知），甚至包括學術界內部的研究趨向。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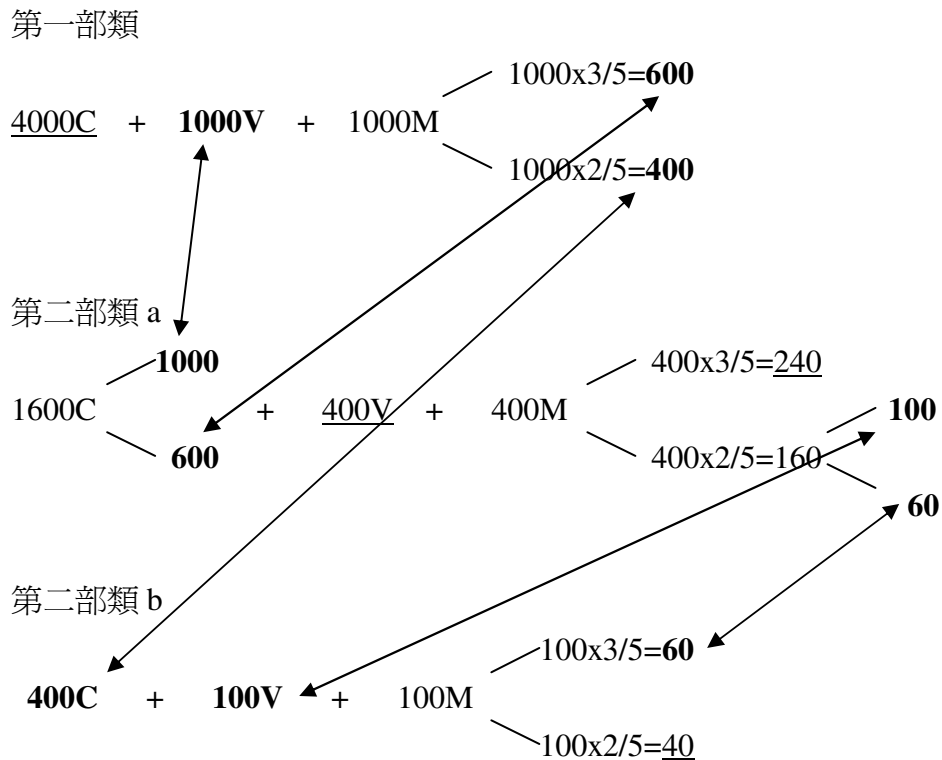
如果從「剩餘」和「積累」的角度來看，爲了獲取剩餘以達成積累，不論是透過國家財政措施來完成，或者是透過市場來完成，只要達到目的，國家財政措施和市場兩種途徑皆爲可能的措施，問題只在於何種方法較爲適當，而所謂適當與否，端看此一國家或社會所在的特定時空環境，以及各國自身的政治選擇。此外，爲求高速現代化和工業化，社會主義國家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原理，籌思一條有別於私有化資本和市場經濟的作法。在革命時期，各國共產黨在理論上講求的是馬克思有關於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及其矛盾問題，一旦取得政權之後，如何當家，馬克思的社會總流通與再生產理論，就益發重要了起來，因爲儘管馬克思是以資本主義作爲研究對象，但是特殊中帶有一般，從馬克思的研究當中，共產黨人也企圖提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理論。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時，依據商品在生產與消費上的不同作用，區分出兩個部類的生產，第一部類即生產資料（機器設備、原材料等，通常重工業屬之）和第二部類即生活資料（生活用品，也稱消費資料，一般而言輕工業和農業屬之，奢侈品也包括在內）。整個社會之間的产品交換，基本上可分爲三種：第一部類內部交換；第一和第二部類之間彼此交換；第二部類內部交換。而這些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來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佈局。¹³

¹²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1985), pp. 4-19; 350-357.

¹³ Karl Marx, *Capital*, vol. 2, pp. 471-487. 由於這裏馬克思係不考慮國際貿易的情況下所作出的分析模型，而由於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前，經濟甚爲封閉，故有許多情況類同於此。

社會總流通與再生產圖示¹⁴



從這個圖示可以看到，所有部類的從業人員都必須向第二部類的產品進行消費，因為那是生活必須，沒有這樣的消費便失去生命。其次，在理想的狀況下，資本主義各部門的生產與各類交換幾能達到綜合平衡，但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利潤導向性的生產等等，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等因素，始終會有不平衡的情形。

15

列寧在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和資本有機構成¹⁶不斷提高的現象時，發現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 19 世紀末時有一發展趨勢，製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即第一部類自身的生產，如工作母機，用以製造機器）增長最快，其次是製造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即第一部類為第二部類生產所需的生產，即一般機器

¹⁴ 其中，C、V、M 分別代表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第一部類 a 表示一生活日用品，第二部類 b 則表示奢侈品，粗黑部分表示不同部類的交換，劃底線則為部類內部交換。第一種交換決定再生產的生產配置，各種生產資料（原材料和機器設備）配置得宜，則來年的再生產可以有效進行，否則將會出現「停工待料」之類的問題。第二種交換決定整個國家內部的經濟綜合平衡，由於第一部類有許多是長期工程，短期內不能完工，但從業人員仍需生活消費，兩者若產生不平衡，將會造成糧食緊缺或糧價上漲。第三種交換則大體上取決於國民收入的情況，人民的消費基金豐富，則儘管經濟成長緩慢，人民仍能豐衣足食，一旦消費基金不足，有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遲緩。

¹⁵ Karl Marx, *Capital*, vol. 2, p. 577.

¹⁶ 指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例，簡單來說即機器、設備、原料／勞動力。隨著工業化和自動化的趨勢，資本有機成將越來越高。

設備)，增長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的生產。¹⁷對於此一趨勢，史達林認為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開始，是由於輕工業需要的投資少，周轉快，獲利容易。輕工業積累集中之後才能投資重工業，經濟重心才能逐漸轉到重工業中去。但此一過程費時太長，共產黨不能走這條路。¹⁸這兩人都注意到了重工業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想法也在蘇聯的經濟發展當中顯示出來。在列寧主政時期，蘇聯有大部分的時間處於內戰和戰後恢復性質的新經濟政策，真正有計劃進行的經濟設計和實踐，都是在史達林手中完成的。史達林所帶起的蘇聯建設經驗，被世人歸結為蘇聯模式，即優先以重工業發展厚植國力，強化國防，再帶動其他部門生產。¹⁹

蘇聯經驗和蘇聯模式，成為了中共在建政時的重大理論依據，尤其中共建政初期，按毛澤東的說法，整個國家建設的佈局，甚至是政府的組織架構，都是「以俄為師」。然而經歷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中共擁有了自身的執政經驗，為加速經濟發展，加上對於中國大陸本身社會經濟特殊性的理解，中共開始籌思一條不同的發展方式，以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根本。

第二節 提高積累的政策導向

在 1950 年代的中國大陸政治、學術氛圍當中，發展生產著毋庸議，是各界贊同的事，但是消費和積累的比例應該如何處理，兩類之間的生產比重又如何看待，則是意見紛陳。另一方面，積累的成果由誰支配，不但攸關計劃經濟的效果，同時也牽涉到社會主義政權的性質。

中共建政之前，中國始終是傳統的農業國家，生產效率低，工業化基礎也很薄弱，加上人口眾多，人均生產力就更加低落。抗日戰爭前，同樣的土地面積，中國投入的勞動力將近為美國的一倍半，但畝產量卻不足美國的一半。1949 年，全國平均畝產糧食只有 142 斤（一斤為半公斤），棉花 22 斤。而工業方面，1936 年中國的煤、鐵、電人均產量分別為 83 公斤、1.7 公斤、7.9 度，而美國則分別為 3498 公斤、244.5 公斤、1144.6 度，其差距一望可知。加上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的耗損，情況就更為嚴重。²⁰因此，如何恢復戰後的經濟，進而加速工業化的腳步，成為中共建政之後的當務之急。其實各國主政的共產黨都非常重視工業化的速度，希望用比資本主義國家更短的時間達成工業化的目的。然而社會主義國

¹⁷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 88。

¹⁸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史達林（史達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496。

¹⁹ Charles Bettelheim,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t Economy*, trans.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The Harvard Press Limited, 1975), pp. 5-7.

²⁰ 董輔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頁 13-14。

家在建政初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封鎖。以中國大陸的情況為例，1950年12月3日，美國商務部宣佈運往中國大陸的一切貨物實施許可證管制辦法。1951年5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大陸和北韓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英國則於1951年5月，在聯合國大會贊同美國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的提案，同年6月宣佈把運往中國大陸的貨物置於特許管制之下。²¹如此的外在條件下，加上自身的工業基礎薄弱，利用農業積累剩餘以為工業發展，成為客觀上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期許自己能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儘速完成生產關係的改造，也是中共在設計政策制度時必然的考慮。問題在於如何達到此一目的：積累要透過市場，還是國家財稅措施？又，積累到誰手上？是國家還是資本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答案顯而易見，積累不能透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來達成，並且積累的果實不能交由資本家。那麼，以國家財稅措施達成積累，並交由國家分配積累，成為必然的選項。

1930年代開始，蘇聯實施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即個體農民和集體農莊每年按國家公告的價格和數量，義務交給國家出售，並在工農業產品交換時產生農產品價格低估、工農產品價格出現剪刀差的方式，擴大對農業剩餘的佔有。史達林認為，這是為了保護剛剛發展的蘇聯工業，而讓農民在交換中「吃一些虧」。²²毛澤東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大陸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在統購統銷的操作下，仍然有著剪刀差，只是比蘇聯為小。²³因此，中共建政初期的許多政經舉措，必須從這個角度理解，方能看出其用意和效果。例如統購統銷制度與農業稅的建制，不但是改造生產關係的政策工具，同時也是加速積累的手段。茲就上述二者為例說明並分析之。

1、統購統銷制度

1952年底，中共基本完成全國土地改革，農民生產熱情提高，反映在糧食產量的提高上。但是與此同時，農民的糧食消費也相應增加，也不急於出賣餘糧，加上糧商惜價待售，一時之間糧食的商品率下降。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治大旗下，在快速發展工業化的壓力下，勢必要從農民的手中徵集更多的糧食，讓越來越多從事非農領域的人有充分的糧食供給。²⁴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決定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採取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根據當時的有關部門統計，因經濟建設而新增加的城鎮人口約達1,700萬人，城鎮居民糧食吃緊，因此確定在同年11月底

²¹ 顧曉英，「建國初期的『禁運』和『反禁運』」，*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上海），1995年第6期，頁48-49。

²²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史達林（史達林）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205-206。

²³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74。

²⁴ 「過渡時期總路線」於1953年才正式提出，但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間，1952年已開始討論。

以前完成各級的動員和準備，12月初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

爲了提高糧食商品率、確保農村餘糧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解決城市糧食緊張，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討論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各部門所提出的辦法，經陳雲的整理，歸納爲八種辦法：只配不徵（農民仍將惜售）、只徵不配（糧商將賺取市價和徵價的差額）、原封不動（後果將更嚴重）、臨渴掘井（非治本辦法）、動員認購（強迫命令）、合同預購（當時沒有把握做好，因農民不習慣製作）、各地自行（中央難以掌握）、又徵又配（即統購統銷）。²⁵在這些各單位所提出的解決辦法當中，陳雲認爲，最後一種辦法是唯一能確保國家能取得糧食的手段，因而向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報，獲得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支持通過。²⁶除此之外，爲了確保城市糧食供應的平穩，不致產生搶購與市場價格大幅波動，1955年還同時發行糧票，管制消費額度。²⁷至於此一政策的名稱，糧食部長章乃器把在農村實行徵購稱爲「計畫收購」，於是徵購被定名爲「計畫收購」，配售也相應地被稱爲「計畫供應」，兩者簡稱「統購統銷」。²⁸

1953年11月19日，中共政務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並於11月23日發佈「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規定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具體辦法。²⁹1955年8月，伴隨農業合作化的快速發展，國務院又公佈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更加詳細規定了關於定產、定購、定銷的規定，使得購銷行爲必須在較大的經濟單位上操作，家戶小農難以進行，因而在政策導向上有利於合作化。³⁰此後雖經大躍進和文革等重大政治經濟變動，統購統銷制度並未再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變化，大多爲修正統購統銷的種類和指標數量，例如1960年又把針織品和綿織品也列入統購的範圍中的作法。

長期用政策手段壓低糧價，造成工農業產品交換時造成的剪刀差。此舉雖然使得中國大陸工資率處於平穩狀態，並且加速了工業積累，但是卻造成兩個副作用，一是找不到有效刺激農民的增產熱情，加上化肥和農業機械的不普遍，使得糧食單位產量始終無法有效提高。1955-1975年間，中國大陸細糧的總產量，從1,648億斤提高到2,596億斤，成長率爲57%，可是產量明顯大幅的提高，卻集中在1970年代化肥和農機較爲大量、普遍的使用之後。³¹換句話說，生產工具的進

²⁵ 括號內的說明爲陳雲對此一類辦法的評價，由筆者整理而成。

²⁶ 劉明鋼，「艱難時期的正確決策——糧食統購統銷的出臺」，**黨史縱覽**（北京），1994年5月，第5期，頁34。

²⁷ 佟屏亞，「糧食，糧票，糧文化」，**古今農業**（北京），1995年6月，第3期，頁18。

²⁸ 熊亮華，**紅色掌櫃陳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83。

²⁹ 陳雲，「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中國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chenyun/879427.htm>。

³⁰ 「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8/content_2388635.htm。

³¹ 相關數據詳見本文表二。關於中國大陸化肥和農機的使用，及其與農業增產的關係，詳見張會玲、張濤依、郭鋼，「農業機械化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現代農業裝備**（北京），2006

步對於產量的影響比起生產關係的集體化，似乎更為有效。可是若考慮到工業積累與農業發展遲滯之間的關連性，如果沒有農業長期爲了工業積累而犧牲，那麼化肥和農機的普遍，可能要更慢。另一個副作用則是農民增收幅度慢。農民生產糧食作物，即使在國家徵收量合理的情況下，基本溫飽雖得以維持，然而由於統購的糧價低，再加上公社或合作社扣除公積金之後，回到農民手中的貨幣量增長極慢，輕工業產品不易透過交換到達農民手中，因而也造成了工農業產品交換（即兩部類之間的交換）的另一種困難。³²

儘管如此，統購統銷政策對於中共建政初期、乃至於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積累和社會轉型，實爲具導向性質的政策工具。統購統銷制度的實施，當時看似一時的權宜之計，然而這只是統購統銷制度形成的表面因素。爲了達到資本積累的作用，以及爲了建立更高度的所有制集中，統購統銷制度可以說是勢在必行。更何況，從蘇聯的經驗當中可知，集體化後的農村更有利於徵集糧食，也更有利打擊農村當中的富農傾向，這對中共而言實是一箭雙鵰：既可達到有效徵集糧食的目的，又可將所有制進一步集中，還可以節省糧食徵集的行政手續。³³因此，統購統銷的長期實施，一直服務於兩大目標：一是爲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供應，一是保證收購到國家必需的工業原料，並爲工業提供資金積累。³⁴正如陳雲早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所說的：「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³⁵根據統計，1950-1960年代農業爲工業以剪刀差方式提供的資金每年100-200億元，70年代後期每年約400億元。³⁶

2、農業稅的變遷

中共建政之初，尙未有全國一體化的農業稅制，而是沿用1947年國共內戰時期的辦法，對未進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區，採取了累進稅農業稅制度；對已實行土改的老解放區，採用了比例制的農業稅。³⁷在1953年全國稅制變革時，又修訂實行了「西北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³⁸換句話說，到了1954年以後，中

年3月，第3期，頁47-49；孟愛華、孟慶福、林海萍、楊鳳雲、常社霞，「化學肥料及其發展動態」，**邯鄲農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河北），1998年1月，第1期，頁26-28。

³² 武力，「1949-1978年中國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2001年4月，第4期，129-135。

³³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p. 12-15. 另可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596-603。

³⁴ 侯利敏，「對中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評價」，頁34。

³⁵ 熊亮華，**紅色掌櫃陳雲**，頁81。

³⁶ 劉超，「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 加速城鄉一體化建設」，**中國經濟評論**（北京），2006年1月，第1期，頁12。

³⁷ 許毅，「『革命根據地財政』詞條」，**中國大百科智慧藏**，<http://140.128.103.1/web/Content.asp?ID=5623&Query=6>。

³⁸ 劉隆亨，張瀛，「當代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重大變革——五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北京社科規**

共在農村的財政措施，既有農業稅，又有統購統銷政策，雙管齊下徵購農村餘糧。1958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正式發布，全國一體適用的農業稅制正式施行。

農業稅在中共歷年的財政收入上所扮演的角色，早期頗為吃重。農業稅收佔中共全國總稅收比例，由1950年代初期的25%以上，大致上呈現逐年遞減的態勢，可是到了1970年代，仍舊保持著10%以上。

表一 中共歷年各項稅收占總稅收比例表

各項稅收收入

單位：億元

年份	合計	工商稅收	關稅	農業各稅	農業稅所佔比例
1952	97.69	65.53	4.81	27.35	27.6
1955	127.45	92.07	4.66	30.72	24.1
1958	187.36	148.37	6.40	32.59	17.4
1961	158.76	130.87	6.23	21.66	14.4
1964	182.00	151.73	4.38	25.89	14.0
1967	196.63	163.76	3.92	28.95	14.7
1970	281.20	242.22	7.00	31.98	11.4

雖然農業稅在早期的全國稅收比例上頗為吃重，然而隨著單位產量的提高，農業稅對於農民的負擔而言卻逐年減輕：

表二 中國大陸農業稅歷年稅收負擔

全國農業稅負擔情況

稅額單位：細糧億公斤

年份	農業實產量	實征農業稅			農業稅占實產量%	
		合計	正稅	附加	合計	其中：正稅
1952	1462.1	178.90	175.96	2.94	12.2	12.0
1955	1648.7	191.98	175.36	16.62	11.6	10.6
1958	1782.9	222.83	194.24	28.59	12.5	10.9
1961	1133.5	105.08	97.40	7.68	9.3	8.6
1964	1683.4	130.24	114.72	15.52	7.7	6.8
1967	2051.1	125.86	111.57	14.29	6.1	5.4

劃網，<http://www.bjpopss.gov.cn/bjpopss/xzlt/xzlt20040518a.htm>。

1970 | 2210.2 | 136.70 | 120.58 | 16.12 | 6.2 | 5.5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http://www.mof.gov.cn/news/uploadfile/quan003.xls>。

從表二中可以看出，除了 1958-1961 年的大躍進期間，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大陸全國糧食的總產量是緩步上升的。換句話說，即使農業稅總量仍然提高，但對於農民而言，光從稅賦負擔的角度而言，並無增加，反而是減輕了，原因即在於一方面實際徵收的糧食由於大躍進的因素而有所減少，另一方面，農業總產量逐年有所提高。

面對千家萬戶的小農，如何有效地徵集農業稅，並達到統購統銷的餘糧徵購的目的，陳雲曾坦承有相當大的困難：「困難不單來自我們對於統購統銷缺乏經驗，主要的是對這樣眾多的農戶，要估實產量，分清餘缺及其數量，很不容易。」也就是說，統購統銷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需要通過農業集體化來解決。³⁹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產生的合作社，成為保障統購統銷順利進行的組織形式，連帶也對農業集體化造成導向作用。1958 年，中共在通過農業稅正式實施之時，財政部副部長吳波也著重說明農業稅實施與促進生產關係轉變的作用：

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已經轉變為集體所有，生產由合作社統一經營，收入也由合作社統一分配了，再採用以農戶為單位繳納農業稅的辦法，就不能和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了。……以農戶為單位納稅的辦法已經沒有意義，徒然增加事務上的麻煩，並且也不利於加強社員的集體觀念。因此，草案第五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律以社為單位繳納農業稅。原來以農戶為單位納稅的初級社，改為以社為單位納稅以後，應當根據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第十九條的規定，相應地減少土地報酬。⁴⁰

在吳波的說明中可知，農業稅在條文中明列徵收對象的單位為初級社，並相應的減少土地報酬，即是以制度設計將農村的所有權向集體經濟傾斜。自 1955 年以來合作化的快速推展，1958 年的農業稅實施，到了 1962 年時，整個中國大陸即已建立起 74,771 個人民公社，703,000 個生產大隊，以及 5,580,000 個生產隊，農業集體化除了政治上的動員，也由於制度設計上的傾斜而快速發展。⁴¹

從上述這兩個例子可知，農業稅和統購統銷制度的興革，一方面是處於經濟

³⁹ 焦金波，「中國工業化積累的主要形式」，*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河南），2002 年 6 月，第 6 期，頁 31-34。

⁴⁰ 吳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草案）的說明」，*法律圖書網*，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381。

⁴¹ 梅德平，*中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研究 1949-1985：以湖北省為中心的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49。

落後的中國為求加速工業化進程所做出的政策方針，一方面是全面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配套措施，更為重要的是，透過這兩項政策的實施，中共的經濟積累才得以快速而有效地達成。農業提供的積累在國民收入積累額中所占的比重，在工業化初期達到40%以上，整個60年代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進入80年代才開始減少。總體來講，中國大陸的工業化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有三分之一來自農業。⁴²由此可見，對於中國大陸而言，農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積累的貢獻，比起其他工業化國家而言特別吃重。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共中央便曾作出估計，預計必須獲得7億兩黃金的資金方能支應一五計劃所需的各項建設資金，其中55.8%是長期投資。就資金籌措的管道來看，當時中國大陸對外的國際貿易所得非常有限，因為中共處於國際貿易封鎖之中，而以蘇聯為主的國外貸款只佔中共國家總收入的2.7%，現代工業所佔的比重也只有全國工業總額的1/4強，因而現代工業本身的積累初期規模不大，真正大量的積累不得不從農業而來。⁴³因此，如何理解到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以及農業發展對於工業發展的支援角色，同時制定出可以達到預期目的的農業發展策略，對於中共經濟和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當中，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有關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提出了一些看法。⁴⁴毛澤東認為，中共比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重工業的投資比重雖然也很重，但是遠較其他各國為輕，輕工業和農業則相對多一些，故而不至於有其他國家的經濟亂象：貨物不夠、生活品不夠、生活不穩定。不但如此，毛澤東還強調要對輕工業和農業增加更多的投資，因為對於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多一些，則資金回收快，積累速度高：

發展重工業，須要有資金的積累。積累從哪裏來？重工業可以積累，輕工業和農業也可以積累。但是，輕工業和農業可以積累得更多些，更快些。……如果你十分注重（重工業），那就要注意發展輕工業，因為：第一是它能滿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積累。⁴⁵

同時，毛澤東特別提出，如果重工業投資過多，長期將會造成片面發展，引發嚴重後果。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當中特別批評那些一意想要投資重工業的部門，他認為，農業和輕工業若不發達，重工業是沒有出路的。如果真要快速工業化，就不能不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重：

⁴² 馮海發，「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1993年第9期，頁60-64。由於儲蓄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要到經改之後才逐漸明顯，故本文暫不討論，而集中在前兩種即農業稅和統購統銷。

⁴³ 侯利敏，「對中國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評價」，*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石家莊市），2000年4月，第4期，頁32。

⁴⁴ 大體而言，重工業是屬於第一部類產業，輕工業則屬第二部類產業，農業則多數為第二部類產業，少數經濟作物作為工業原料，則應歸類為第一部類產業。

⁴⁵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思想萬歲*，頁42。

用少發展一些輕工業和農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這是一種辦法。用多發展一些輕工業和農業，來發展重工業，這又是一種辦法。前一種辦法，片面發展重工業，不照顧人民生活，後果是人民不滿意，重工業也不會真正搞好。從長遠觀點來看，這種做法，反而使重工業發展得慢些和差些。幾十年後算總帳，那是划不來的。⁴⁶

在這篇講話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高度關注。首先是輕、重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在這裏所提出的看法，與史達林有了明顯的不同：比起史達林，毛澤東更加強調和肯定了輕工業和農業的角色，同時他也注意到在進行資金積累時，輕工業和農業資金回收快，應該有更高比例的發展，並且最終將有利於重工業積累。這樣的想法特別著重在於重、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強調彼此之間的動態平衡，雖然中共高層決策的目標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即快速提高工業積累、快速達成工業化、首先發展重工業，但是做法不同：一是直接加重重工業的投資，一是在以重工業為主的前提下，更多地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以利重工業日後的資金回收和積累。後者勢將調整中共原有的工業和經濟佈局，以及國家預算的使用和分配，從而影響到各部門手中的預算額度，並且造成各部門重要性的升降，也因此可能會牽動中共內部人事和派系的變化。不過，毛澤東的上述思路並未有效執行，儘管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提出了農業「以糧為綱」和工業「以鋼為綱」的「兩條腿走路」的口號，但是大躍進的決策完全打破了上述的思考方向，重工業的比重還是過高，生產關係的變革過快也造成了許多反彈，終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

大躍進所引發的嚴重危機，有許多國內外因素所致。可是，當時中國大陸政界和學界對於高速度發展的迫切心態和氛圍，可以說是極為重要的背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才能有較為全面的看法。

第三節 加速經濟積累與節制生育：馬寅初「新人口論」一文的核心和重點

1957年7月，正當馬寅初在人大代表會中提出「新人口論」的書面報告時，中共的大躍進決策雖然尚未正式出現，但是在此之前，中共高層的會議與報告，以及許多學者所發表的文章和言論當中，卻已顯現了對於經濟高速度發展的期待。其實從1955-1958年間，中共黨政高層針對當時經濟發展的態勢，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大體而言，即是集中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同時也牽涉到生

⁴⁶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思想萬歲，頁43。

產關係改造的進度。由此並且產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風向的變動：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最終走向了大躍進的決策。關於生產關係的改造進度問題在此暫且不表，馬寅初「新人口論」一文的重心在於如何提高經濟積累的速度，此一問題的實質，則在於消費與積累的比例是否過高或過低。因此，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個大背景，同時還考慮到馬寅初不但是北京大學校長，同時也是中共所組建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是陳雲），那麼則更可以瞭解馬寅初此一報告的用意。

早在 1956 年，中共八大會議期間，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薄一波等人對大會所提交的報告，都曾針對必須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提出看法和說明，其中又以薄一波所做的說明最為具體和明確。

薄一波認為，中共在「一五」計劃時期經濟發展穩定增長，將能超額完成「一五」計劃的各項經濟指標。如果一切順利，那麼就完全有可能在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但是，

要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就必須要有和它相適應的資金積累，而實現積累的道路，由於我國社會制度本質所決定，則只能依靠國內積累。這樣，積累的多少和快慢，就不僅直接地影響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而且也直接地影響人民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改善的程度。⁴⁷

薄一波特別提出，對中共而言，「實現積累的道路，由於我國社會制度本質所決定，則只能依靠國內積累。」這句話中明顯表現出中共主觀上的政治導向用意。因此，為了工業化，薄一波認為，在總體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人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僅應當低於社會生產發展特別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而且應當低於積累的增長速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積累不斷地增加，社會主義再生產不斷地擴大，人民消費水平提高所依靠的物質基礎不斷地增強。⁴⁸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當時的估計，中國大陸經濟的積累／消費比例如下：

年分	積累／消費比
1952	15.7 / 84.3
1953	18.3 / 81.7
1954	21.6 / 78.4

⁴⁷ 薄一波，**薄一波文選（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 556。

⁴⁸ 中共的經濟思維當中，全國的生產總值＝全國的總消費＋總積累，而消費則可分解為各種形式和名目的收入，如工人的工資、資本家的定息等；積累則是為了擴大再生產（維持原有規模的新一輪生產所需＋新增的生產所需）所儲備的基金，在簿記中多分為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兩種。

1955	20.5 / 79.5
1956	22.8 / 77.2 ⁴⁹

而 1952-1956 年間，消費基金增長了 26.7%，每年平均增長 6.1%；積累基金增長了 101%，每年平均增長 19.1%。積累基金在國民收入使用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即積累率），大體呈現了逐年略升的情況，一方面顯示出當時中共經濟的穩定發展，二方面也看到了經濟積累在比例上的逐步提高。

在薄一波看來，這幾年以來的積累比重大都維持在 20% 左右，這樣的積累速度和比例是剛剛好的，過快過多了則不行，因為「欲速則不達」，將造成經濟混亂；過少也不行，會拖慢整體經濟建設速度。

薄一波八大會議期間的報告，正是反冒進的運動期間（1956 年初到 1957 年初）。毛澤東反對以周恩來為主導的國務院提出反冒進的口號，眾所皆知。根據薄一波的說法，此一時期的毛澤東由於將心力主要關注在史達林問題和波匈事件上，對於國內經濟發展的問題採取了守勢。⁵⁰然而進入 1957 年後半期，史達林的問題和波匈事件均告一段落，中共內部的反右運動也大體完成，毛澤東就想恢復因反冒進所反掉的三個東西：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⁵¹多快好省是 1956 年初提出的經濟建設口號，四十條綱要則是指「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則意指中共幹部在經濟建設上要做促進派，不要做促退派。所謂的促進，不但表現在產量上的增加，同時也表現在生產關係的改造上。在毛澤東看來，反冒進運動雖然意在防止急躁情緒、浮誇虛假，原本只是技術性和業務性質的問題，但卻連帶掃掉了這些好東西，這些東西不屬於業務性、技術性的事務，而是政治性、方向性的。然而同樣的作用是，毛澤東在政治上提出反反冒進的口號同時，業務面和技術面和卻也就跟著再度產生急躁情緒、浮誇虛假的情形。

毛澤東對於反冒進的批評，並不是突發的或孤立的事件。中國大陸內部自建政以來始終對於高速度發展有著高度的期盼：一方面是窮怕了，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和決心：一定要在生產力方面表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反冒進期間，政界和學界便有許多要求更快加速積累的聲音。例如當時任職中共國家統計局研究室主任的楊波，就認為這樣的積累速度太慢，無法有效而快速改善中國的孱弱經濟體質：

目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還比較低，基本原因是受經濟落後、生產力水

⁴⁹ 薄一波，**薄一波文選（1937-1992）**，頁 559。

⁵⁰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 641。

⁵¹ 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收錄於**毛澤東思想萬歲**，頁 49-57。

平低的影響。而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如果最近一個時期不適當地增加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基金，加速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不以新的技術不斷地改善和裝備國民經濟各部門，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則改善人民生活也就成為一句空話，缺乏可靠的雄厚的物質基礎。我認為在最近一個時期內，即在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在保持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的原則下，適當地多增加一些積累基金，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於全國人民的利益的。……許多同志在觀察積累率的時候，往往把積累基金的增加，簡單的看成都是與改善當前人民生活直接相矛盾的事情。其實這是不對的，是不全面的。因為積累基金中的非生產性積累，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直接用於改善人民當前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⁵²

細觀楊波全文，他並非盲目要求無條件提高積累比率，也強調積累率的提高有一定的限度，以蘇聯的經驗來看，長期以來，蘇聯的積累率始終在 25% 左右，比中共的 18-22% 為高，這似乎就是蘇聯積累率的飽和點。但是中國並不該死守著不能超過這個比例，因為國情不同：

當我們與外國的積累率進行對比研究時，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各種社會產品的價格構成和價格水平的差異這一極重要因素。……1956 年中我國的重工業產品降價很多，而前面說過積累的物質內容主要是重工業產品，因之用現價和不變價兩種不同價格計算的積累率，也就相差很大。由此可見，當我們研究消費和積累的比例或與外國進行對比時，必須同時考慮到各個不同時期或不同國家的各種產品的價格構成和價格水平之間所存在的差別這一極重要的因素。不考慮這一因素，不具具體分析，簡單的以為某某國家的積累率是多少，從而也就認為我們的積累率也不應該超過多少，是不對的。⁵³

至於農民收入增長有限，工人收入有較為明顯增長的情形，楊波認為這不是因為工業積累過多的問題，而是農業增產量相較於工業少的因素，換句話說，工業積累多一點並不會排擠農業增長。因此，在楊波看來，只要在不超過飽和點的情況下提高積累，並不會產生整個國民經濟的負面因素，也不會影響農業收入的增長。

工業積累最終要轉化成基礎工業的各種所需，鋼材便是最具體而重要的表徵，因而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綜合國力指標當中，往往把鋼產量作為工業化的衡量標準。就在同一期的**經濟研究**雜誌，任職於中共國家計委工業生產綜合計畫局的余建亭認為，由於中國大陸產業結構的變化，鋼材在一部分領域的

⁵² 楊波，「試論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經濟研究**（北京），1957 年 6 月。

⁵³ 楊波，「試論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問題」。

需求有所減緩，尤其是直接消費層面（即第二部類），但是在機械製造方面（即第一部類）的需求卻增長了，總體而言，未來中共的經濟佈局當中，必須增加對鋼材生產的投資，方能滿足新的鋼材需求，「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對鋼鐵工業的投資，在可能範圍內，應給予適當的滿足。」⁵⁴全文儘管隻字未提高積累，但是這樣的要求如果沒有更多的資源配置在重工業領域，是不可能達成的。而重工業領域的資源配置的提高（如增加國家預算中對重工業的投資比例），即是增加工業積累的具體措施。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來重新閱讀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或許更為符合馬寅初當時發展此一文章的心境和用意。「新人口論」一文的主要論點已如第三章所述，本章在此將集中在消費與積累的問題上。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一文開頭的前幾段，一方面說明中國大陸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二方面也交代了自己研究此一問題的動機：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一定要增加積累；要增加積累，一定要增加國民收入。我國的國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將近九百億元，其中消費部分約為 79%，積累部分約為 21%。因人口大，所以消費大，積累小，而這點積累又要分攤在這許多生產部門之中，覺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⁵⁵（粗黑為筆者所加）

在他看來，人口問題並不像是陳達和吳景超等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是直接造成中國貧窮的原因，但是人口多卻也造成經濟發展不易，原因在於消費過多而積累過少。在「新人口論」文中，馬寅初還交代了自己的研究過程與遭遇：

1955 年視察返京以後，就視察所得準備好關於人口問題的發言稿，內容是「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打算在 1955 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組進行討論，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餘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於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今年 2 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中明確地提到人口問題，我認為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及時，也非常必要，我就把舊發言稿在擴大最高國務會議上簡略地講了一

⁵⁴ 余建亭，「我國鋼鐵工業與機械工業的比例關係問題」，*經濟研究*（北京），1957 年 6 月。

⁵⁵ 「新人口論」一文由於各時期版本內容有所差別，本文的討論將以 1957 年 7 月 5 日人民日報所刊載的版本，因為當時各方批判皆是以此為本，以下各段引文之出處不再另行說明。

遍。現在就把這篇稿子加以補充，提出來請各位代表指教。

這段經歷即本文第二章所提到的事件。由於當時有人批評馬寅初論點是馬爾薩斯主義，因此馬寅初在這份修正稿當中，特別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反駁並批評馬爾薩斯主義：

馬爾薩斯**人口論**於 1798 年出版，當時正值工業革命以後，社會經濟發生根本性的變動，工人們大量失業，普遍貧窮，時有暴動，人民對於資產階級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滿。馬爾薩斯寫**人口論**的本意，就在於從理論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政府，掩蓋英國政府的錯誤措施。他的人口理論無異乎告訴工人們說，工人們的普遍貧困，不是政府之過，主要是由於人口增加太快，而糧食增加太慢引起的。這種論調是他**人口論**的出發點，也就在這一點上他根本錯誤了。……土地和勞動力這些自然條件，雖是農業生產最根本的條件，但它們在發展生產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學的發展則是無止境的。科學愈發達，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識增加，一方面促使勞動生產率增長，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減低，例如社會上層分子和腦力勞動者，娛樂的方式較多，如打球、划船、騎馬、打獵等多方面的活動，減低了他們的性欲。在法國上層分子的生殖率停滯不變，他們把生兒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約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島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並不跟著增加，主要是因為該處的居民並不是喜歡多子多孫的，這又有力地反駁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此他的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的理論也就此破了產。

在此，馬寅初係以兩種方法反駁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一是經驗反証法，一是加入科學此一範疇指出馬爾薩斯預設上的不足。這兩種批評的不足之處，本文第三章已經指出，在此按下不表。馬寅初認為，「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措施出發，我則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出發。」他以工業化的倉儲設備為例，以往人工翻穀通風、收入倉庫，五十斤的糧食需要三百個勞動力，並且要花一年半才能完成。如果用蘇聯引進的最新式機械化倉庫設備，每個倉可存七噸的糧食，十五個技工在六天內便可完成一次通風。如此一來，便節省了 95% 的人力，但這十五個技工的工資可相對提升，改善生活品質。但是節餘下來的勞動力才是問題：

那 95% 的人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用什麼方法來提高呢？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

馬寅初認為，社會主義越發展，機械化便越多，規模也越大，人力的節省是必然的趨勢，到時這些多餘出來的人口勢必影響工業化的速度：

我們現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業，要多搞中、小型工業，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小型工業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國搞社會主義，就應當多搞大工業，**列寧也說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列寧文集**第七冊第一百五十一頁）。然而，我們過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使我們不能大踏步前進。有人稱我為馬爾薩斯主義者，我則稱他們為教條主義者、反列寧主義者。

同時，馬寅初強調，要增加積累資金的辦法都不可行，只能靠節制人口：

1956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將近九百億元。其中消費占79%，積累只占21%，即等於180多億元。……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我們不屑向美國借款，我們亦不能用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的方法來榨取資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賠款作為工業化的本錢，我們只得自力更生。……可否把消費減少一些，把積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國實際情況，這是帶有危險性的。……我們不能如蘇聯一樣把積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費壓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於說我們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了，不免會出亂子。……我們現在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萬多餘人口放在農村，雖然出於不得已，但難免發生副作用。……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雖不致蹈波、匈的覆轍，然亦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因此，**我主張要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一面要積累資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話，徒勞無功。**

在馬寅初看來，積累不能提高，人口不能有效節制，小則減慢經濟積累，大則造成內政不穩定：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言：蘇聯生產能力的繼續增長，是由於每年技術裝備的倍數增加。中國以後的情況也應該這樣，因此要提高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就要大力地積累資金，加強每個工人的技術裝備，同時還要控制人口，因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資金很難迅速地積累。積累資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後工人的收入也當然提高，如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不能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別愈來愈大，就影響著工農聯盟，因此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

至於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當中所提出的要加強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馬寅初是贊成的，但是：

擴大輕工業的建設，必須在資金和原料足夠的條件下進行，因此我們要談一談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輕工業的原料絕大部分來自農業，我們要建設棉紡織業，一定要向農業取得棉花；……今日油、糖、布的供應，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它們的緊張情況，超過糧食。要增加這些物品的供應，一定要擴大棉花、蠶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經濟作物的面積，這不得不縮小了生產糧食的面積，而糧食產量就受到了影響。所以**各種經濟作物與糧食互爭土地，二者之間一定要求得一個適當的平衡**。若人口無限增殖，這一適當平衡將更被破壞，因人口增殖，糧食必須增產，經濟作物的面積就要縮小，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影響到重工業。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至於如何提高農業增產，馬寅初也提到了中國自然條件對於發展農業的不利之處：

全國六億四千萬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畝地。雖有人說我國有十五億畝荒地，但**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沒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數民族世代代藉以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開墾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開墾，迄無確實統計，加以工業落後，財力有限，一時尚不能大規模進行墾荒。……農民收入之不穩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必需多興辦像三門峽這樣的大水利工程，這有待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推行，尤有待於資金的多多積累。故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在說明了經濟發展各方面都必須控制人口之後，馬寅初提出，節制生育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著手：

- 一、提高人口統計的準確性。如出生、死亡、結婚、離婚和遷徙等都應有完整的統計公佈。
- 二、加強宣傳晚婚，打破傳統觀念。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
- 三、加強宣導避孕，切忌人工流產。一則因為這是殺生，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則會沖淡避孕的意義，年輕的婦女們就會不關心避孕，把希望寄託在人工流產上，增加醫療工作的負擔。

其中「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的說法，隱然與 1978 年中共開始實施強制性計劃生育與一胎化政策的施政理念若相符節。根據本文第二、三章

的研究顯示，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最早起源於 1954 年，重點放在宣傳和教育層面，並設法提供避孕工具，除了文革初期工作受到衝擊，在此之前一直到 1978 年，並未有法律上和政策上的懲罰措施。一直到 1979 年，中共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並用立法形式將實行計劃生育固定下來之後，國家不但干涉了生育，控制人口，更把傳統國家機器對於犯罪處理的規訓—懲罰手段，用於計劃生育上。從近年來中共實施計劃生育在中國大陸城鄉所引發的不滿與反抗，一方面可以看到儘管經過數十年的教育，節制生育的觀念在中國大陸仍有許多反彈聲浪，另一方面，此一理念形諸政策竟是以如此粗暴的形式，想必也非馬寅初所樂見。⁵⁶

回到本章的主題，即人口增長與經濟積累的關係，馬寅初認為當時中國大陸積累率太低，其中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生產力過於落後，提高生產力對於積累而言，是開源的做法。但是生產力的提升並非一夕而就，因此除了開源的辦法，還要有節流的措施，即控制人口生育。另一方面，由於控制人口可以使得消費減少，因而相對地可以加速積累，從而對開源也是有幫助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試著比較毛澤東和馬寅初的觀點來看，二人都是在以國家作為積累的主要工具的前提之下，對於中國大陸快速工業化的方法提出不同的見解。毛澤東強調要增加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但是馬寅初則強調要以控制人口的方法減少消費，增加積累率。兩人的看法有部分的重疊的，有部分則是相反的。重疊的部分是，二人都贊成要節制生育，但現存的六億人口如何處理，馬寅初並沒有多所著墨，毛澤東則認為必須在政策上設法讓六億人口完全就業，因為在毛澤東等人的看法認為，除了天災人禍等因素之外，社會主義理應是零失業的。為了達到全完就業，毛澤東選擇了多發展中小型企業以吸納過剩人口，⁵⁷從而形成了不充分就業、冗員充斥或人均生產效率低下的情形。馬寅初對這些問題是不滿意的，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應該是大工業，並引列寧的話來論證。關於這一點，包括許多蘇聯專家的意見，以及受蘇聯影響較為直接的中共中高層領導幹部當中，佔有重要份量，吾人也可以從上引楊波和余建亭的文章中如此強調加快重工業發展、提高工業積累和鋼產量的觀點當中看出梗概。⁵⁸

1960 年代以後，大躍進的後果是極為明顯的，重工業不但在產量上並未如預期中的超快速增長，品質也是良莠不齊。更為嚴重的是，農業生產的再生產秩

⁵⁶ 中共近三十年來所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引發城鄉居民強大的反彈，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執行的方法上。詳見 Tyrene White, *China'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2005*. 尤其是本書第二、六、七章。

⁵⁷ 關於毛澤東主張在 1950 年代時多建中小型企業的看法，詳見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92。

⁵⁸ 當時中共政學各界對於重工業的大體看法，還可參照曹陽，「發展的陷阱：誤入歧途的工業化——從制度結構分析的兩種工業化類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994 年第 16 期，頁 19-24。

序完全被打亂，加上天災和人禍（姑且不論天災與人禍之間的比例為何），中國大陸農村的飢饉現象、城市糧食普遍缺乏的場景紛紛出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當中所提示的社會總流通與再生產理論，其中所強調的各部類之間及各部類內部的動態平衡與交換，雖然在若干學者的討論中被提及，然而在現實層面，上述理論的討論即使只是作為原則，似乎一點功效都沒有發生。馬寅初等人強調優先重工業、增加工業積累的看法，並不能直接聯繫上他必定贊成城鄉大煉鋼鐵這一類的具體措施。可是回到 1958 年，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馬寅初、張培剛、楊波、余建亭，以及其他參這些相關問題討論、批評和反批評的人，他們之間的爭論，或許他們或多或少都清楚在這些筆墨官司的背後，會是一場決定千萬人性命交關的政策方向的論戰，但是一定不知道這個政策方向執行下來所造成的巨大損傷，卻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實踐歷程當中最為恐怖的後果。理念、原則、方向上的堅持性，並不能排除具體措施上的靈活性。然而由於權力與真理的一致化，馬克思主義的靈活性和生命力，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已幾乎不容許保留、中立或第三條路的空間。

